

◎ 艾华 编著 刘同干 主审

中国近世文化思潮

ZHONGGUO JINSHI WENHUA SICHA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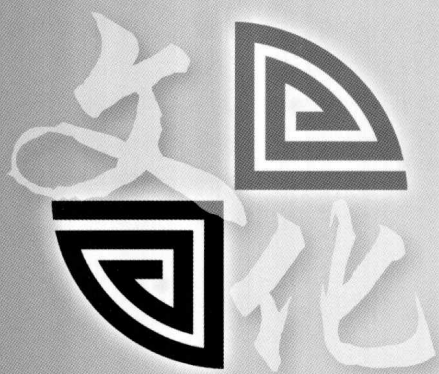


安徽大学出版社

◎ 艾华 编著 刘同干 主审

中国近世文化思潮

ZHONGGUO JINSHI WENHUA SICHAO



安徽大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简要介绍了从明中叶至辛亥革命这一历史时期中国文化史上的主流思潮。全书共分四章,按历史顺序分别评介了晚明人文主义思潮、明清之际启蒙主义思潮、嘉道之际实学思潮和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的新民思潮。较为详细地评介了这几大文化思潮产生的时代背景,特点及其内涵,并重点评介了在这些文化思潮中涌现出的具有代表性的历史先进人物的思想和体现了时代特征并有一定影响的文学作品。学术性和通俗性相结合,适合大专院校学生和广大文学爱好者阅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近世文化思潮/艾华编著.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8.3

ISBN 978-7-81110-407-3

I. 中... II. 艾... III. 学术思想—思想史—中国—近代
IV. B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33804 号

中国近世文化思潮

艾 华 编著 刘同干 主审

出版发行 安徽大学出版社

(合肥市肥西路 3 号 邮编 230039)

联系电话 发行部 0551-5108397

责任编辑 李镜平

特约编辑 李南蓉

封面设计 孟献辉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合肥创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3.75

字 数 225 千

版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1110-407-3

定价 22.00 元

如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前言

本书简要介绍了中国从明中叶至辛亥革命这一历史时期的文化思潮。以代表历史进步方向的主流思潮的变化为线索,着重介绍这一历史时期在思想文化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风云人物的思想和作品。因所论及的文化思潮是从明中叶至辛亥革命这一较长阶段内的主流思潮,所以采用了“近世”这一相对宽泛的时间概念。所谓“思潮”,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曾作出如下解释:“凡文化发展之国,其国民于一时期中,因环境之变迁,与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进路,同趋于一方向,于是相与呼应汹涌,如潮然。……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则‘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应于其时代要求者。”这说明,首先这种思想必须有价值,能够适应时代的要求,代表历史发展的进步方向,同时这种思想潮流是能够“相与呼应汹涌”的,即对当时的社会思想文化有重大影响。因此,本书以近世人文主义思潮为主线,选择在思想文化史上有代表性的人物及作品为重点,以点连线,力求梳理出一条近世进步思想潮流的线索,呈现它波澜起伏的状态。

近世是中华文明史上最具特点和富于变化的时代,与古老的封建制度揖别,对封建思想文化展开广泛批判,扫荡旧时代的污泥浊水,接受西方文化和思想价值观的冲击,摆脱殖民主义的奴役,挺直民族的脊梁,以东方巨人的雄姿重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自新与救亡图存,是那个特殊时代中国人无可推卸的历史重任,同时也给文化思潮的形成发展带来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为社会变革、民族更新呼吁,为反帝救亡、民族生存呐喊,成为其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以李贽为

代表的晚明思想家对封建思想文化的尖锐批判、龚自珍等一代志士对封建末世颓废之像的揭露、梁启超等维新人士借助文学来策动新民救国风潮的举动，这些都形成了优秀的文化传统。同时，不断降临的民族灾难、疮痍满目的现实世界，也吸引了众多先进之士自觉地为自身与民族的生存解放而呐喊，以巨大的热情自觉参与历史变革的进程，与民族的文明进步荣辱与共，是近世文化思潮最鲜明的思想特色。

同时，这一历史阶段又是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大碰撞、大融合的时代。梁启超曾形象地预言：“盖大地今日只有两文明：一泰西文明，欧美是也；二泰东文明，中华是也。20世纪，则两文明结婚之时代也……彼西方美人，必能为我家育宁馨儿以亢我宗也。”（《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大势》）中西两种文明既相互冲突又相互融合，中国传统文化既被继承又有所更新，这使整个近世文化思潮独具魅力，异彩纷呈。而在这一历史过程所凸现的重要命题：如何在吸收西方先进文明的同时保持自身的特色和优秀传统文化，至今仍是值得探讨和深思的重大课题。

通过这一阶段文化思潮的学习，既可以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又可以引发我们对传统的继承与创新、对西方文明的吸收与扬弃等一系列问题的进一步深入思考。

艾 华

2008年3月

目 录

前 言

第一章 晚明人文主义思潮..... 1

第一节 晚明的思想狂飙 2

一、晚明人文主义思潮产生的时代背景..... 2

二、泰州学派的主要思想贡献 9

三、晚明最杰出的思想家——李贽 12

第二节 人文主义狂飙激荡下的晚明文学 16

一、旨在暴露黑暗的“哀书”——《金瓶梅》..... 16

二、晚明市民文学的代表作——“三言”“二拍”..... 22

三、汤显祖和他的“临川四梦”..... 27

四、神幻中寓哲理的《西游记》..... 31

第二章 明清之际启蒙主义思潮 37

第一节 清初三大家 39

一、一脚踏进未来的伟大思想家——黄宗羲 39

二、清代朴学的开山祖——顾炎武 45

三、中国古代哲学的总结者——王夫之 49

第二节 清初启蒙思想家的学术贡献和影响	58
一、学术上提倡经世致用	59
二、重新审视古代文化,提出近代意义的理论命题	61
三、充当文化清道夫——提出“六经皆史”的观点	63
四、晚明和清初两大文化思潮异同	64
第三节 启蒙主义思潮影响下的清初文学	66
一、《桃花扇》	67
二、《儒林外史》	74
三、《红楼梦》	86
 第三章 嘉道之际实学思潮	94
第一节 嘉道经世实学思潮特点及其社会影响	97
一、嘉道经世实学思潮的特点	97
二、经世实学思潮的社会影响	98
第二节 龚自珍的思想和文学创作	101
一、龚自珍的生平	101
二、龚自珍的人文主义哲学思想特征	102
三、龚自珍的文学创作	107
第三节 魏源和他的“师夷长技以制夷”	112
一、“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提出在中国近代史上的意义	112
二、魏源在“古今”之争上的进步立场	114
三、魏源在近代哲学上的其他贡献	115
 第四章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新民思潮	118
第一节 新民思潮的特征和内涵	118
一、西学东渐的内容和过程	119

二、“救亡”与“启蒙”两大主题的凸现和矛盾	121
第二节 新民文化思潮的影响	124
一、教育体制的变革	124
二、留学事业的发展	125
三、翻译事业的兴起	125
四、知识群体的变化	126
第三节 新民思潮影响下的文学革命	129
一、近代文学革命的发展阶段	129
二、文学革命的主要内容	131
三、文学革命的成绩	135
四、文学革命的缺陷和不足	137
第四节 新民思潮中的杰出人物	138
一、严复和他的“天演之学”	138
二、封建思想向资产阶级思想方向蜕化的典型——康有为	147
三、冲决封建网罗的勇士——谭嗣同	151
四、双重角色的梁启超	153
五、“有学问的革命家”——章太炎	171
六、南社与柳亚子、苏曼殊	178
七、学贯中西的王国维	188
八、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	203
主要参考文献	212

第一章 晚明人文主义思潮

中西两种文明在各自的形成与早期发展中相对隔绝,但一些文化现象的出现却是不谋而合。大约在西方出现大哲学家苏格拉底的时代,中国出现了孔子。在16世纪,西方出现了伟大剧作家莎士比亚时,中国也出现了关汉卿。

西方社会在经历了漫长的“中世纪冬眠”后开始了新的生命复苏,走向近代时,作为新兴资产阶级思想旗帜的人文主义思潮,以摧枯拉朽之势,荡涤着中世纪的神本主义、蒙昧主义的污泥浊水。人文主义者反对天主教会的精神独裁,憎恶神学的禁欲主义,抗议封建制度的束缚。他们呼唤人们把目光从神转向人,从天堂转向尘世。他们认为人生而平等,个性自由不可侵犯,现实幸福高于一切;享受平等、自由、幸福是人普遍具有的自然本性,而这种自然人性在黑暗的中世纪被长期地压抑和埋没了,现在需要重新发现和肯定。人文主义的兴起,把人们从虚幻的神学彼岸引回现实的自然界和有血有肉的人间,以“人”对抗“神”,思想界这一场轰轰烈烈的人文主义革命,史称“文艺复兴”,并由此拉开了西方近代革命的帷幕。此后,又经过天翻地覆的宗教革命和震撼人心的科学革命,西欧各国渐次步入了近代化的社会历史进程。这一时期最杰出的剧作家莎士比亚在其名著《哈姆雷特》中的一段名言,“人,万物的灵长,宇宙的精华”,成为当时人文主义者的口号和宣言。

在西方近代革命拉开帷幕的同时,位于世界东方而处于相对隔绝的地理环境中的古老中国如何呢?值得骄傲的是,古老的中国与此同时也掀起了一场具有近代意蕴的思想界革命,与西方的“文艺复兴”在思想上非常接近,并且更加惨烈悲壮。一批身处明代中后期、敏感而富有朝气与战斗精神的思想家,勇敢地对封建专制和思想权威发起攻击,反对无所不在的天理,呼唤心灵与情感的自由,主张将世间的伦常道德,建立在个人幸福、快乐的

现实生活基础上。他们为了宣传和实现自己的理想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我们把这场思想运动称之为“晚明思想狂飙”，这是一场与欧洲的文艺复兴十分相似的人文主义思潮。

第一节 晚明的思想狂飙

商业资本主义的繁荣与市民意识的崛起，禅、道、儒三教的融合与世俗化倾向，陆王心学与程朱理学的双水并流，心学渐次取得优势地位，是晚明思想狂飙产生和发展的社会与思想基础。

为了把这个问题讲清楚，让我们先来对晚明人文主义思潮产生的时代背景作一些分析。

一、晚明人文主义思潮产生的时代背景

16世纪商品经济的繁荣及新兴的工商城镇、商业资本集团的形成，对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形态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但其发展一直停留在以私人获得资本，通过交换以谋取利润为特征的商业资本主义阶段，并没有显示出向产业资本主义转换的趋势。正是从这里，中国走上了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方向不同的进化道路。虽然16世纪商业资本主义的繁荣和发展，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封建的经济和社会形态，但是却给社会结构和社会价值系统带来了不可忽视的变化，并对意识形态各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泰州学派所掀起的思想界革命正是这种影响的表现和反映。

1. 明中叶商业资本主义的萌芽对意识形态领域产生巨大影响

中国传统的社会生产结构，是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体的，商品经济只是补充。16世纪前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逐步提高和社会分工的扩大细化，商业日趋繁荣。国内除了明代以前已经形成的大中城市外，在江南以及东南沿海的运河沿岸，又出现了一批新兴的工商城镇，并形成了不少地域性的商业资本集团（如徽商、晋商）。

随着工商业的发展、新兴工商城镇和商业集团的形成，一部分富有眼光的地主和富裕的自耕农民，改变了以往仅投资于土地以期获得地租的单一的资本积累方式，而直接参与经营或投资于手工业、商业，成为脱离了土地的商人。在工商业发达地区，一些农民弃农经商，流入城市，也成为小商品

生产者或雇佣工人。由于明代人口骤然大增,使仕途上的竞争越发激烈,而商人看似轻而易举的成功,诱惑着读书人弃儒从商。城市中的地主商人、小商品生产者、雇佣工人和弃儒就商、亦儒亦商者成为新的社会共同体——商人——市民阶层的主要成员。

迅速扩大的市民阶层,显示出独特的价值取向和道德观念。他们不满足于现有的社会秩序和“商末农本”的传统价值观念,而强调商业活动的贡献和不可替代性;他们希望提高商人的社会地位,不无自负地提出“良贾何负宏儒”这类带有挑战意味的口号;他们鄙薄儒者“口不言利”的虚伪而肯定“治生”的必要性和“私利”的合理性,他们不掩饰对各种人生欲望的渴求,并把它看作是成功的动力。他们热情地呼唤与创造着符合商人—市民阶层利益和审美趣味的文化与文学。而晚明思想狂飙从某种意义上讲,便是一场商人—市民思想文化运动。

而晚明意识形态领域的另一个变化表现为文学审美趣味通俗化。由于手工业和城市商业的繁荣使市民阶层迅速扩大。市民阶层人数众多、人员复杂,包括了商人、作坊主、手工业工人、自由手工业者、艺人、妓女、隶役、各类城市贫民和一般的文人士子等。明代中叶后,仅苏州一地从事纺织业的人数就达近万名。景德镇 10 万人口中从事陶业的手工业者就有数万。在这些市民中,商人经济实力雄厚,生活奢靡,逐渐引起了人们的注目和羡慕。如富甲吴中的巨商张冲,每有一衣制成,其款式即成为市民争相模仿的样板,足见商人对市民社会影响之大。商人们附庸风雅,与士大夫往来唱和,成为风气。文人士子也逐渐改变了不屑与商贾为伍的清高态度,开始从相对封闭的圈子走出来,留恋繁华城市,习惯于出入市井,乐意与商人、名工巧匠、出色艺人等交游,越来越具有一种世俗平民化的特征。特别是明代中后期的文人圈中,未入仕途的平民文人人数众多,相当活跃。其中不少人本身就出身于商人家庭,如对文坛有很大影响的李梦阳、李贽祖辈就曾经商。在江浙地区,情况尤为突出,如高濂、唐寅、屠隆、汪道昆、顾宪成等都出身商家。一些缙绅士大夫弃儒经商或涉足文化市场的也屡见不鲜,如凌濛初就兼营印刷业。总之,明代中后期,文人与商人市民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他们相互熟悉、相互影响,逐步产生一批受到市民思想、感情和艺术趣味熏陶的,并愿意为市民服务的文人士子。这批世俗化的平民文人同时与商人、手工业者、艺人等市民相结合,又形成了一批新的读者群。

文人的平民化和市民化读者群的形成,自然改变了文学作品的面貌。

市民的生活,市民的情趣、市民的形象在明代的诗、文、小说、戏曲中越来越显得举足轻重。诗人歌唱起“即此城中住亦甘”,“经车过马常无数”(沈周《石田稿》)的都市生活,赞美“翠袖三千楼上下,黄金百万水西东”(唐寅《六如居士全集》卷二《阊门即事》)的繁华景象,毫不掩饰对美色和金钱的欣羡,甚至高歌恣情纵乐,在俗世的追欢逐笑中,寻求人生的乐趣。在小说和戏曲中,更是广泛而深刻地表现了市井生活。在《金瓶梅》中,商人已成为一部长篇小说的主人公,而在“三言”“二拍”的短篇小说中,市井中种种角色也被表现得淋漓尽致。他们或极尽奢侈,或克勤克俭,或历尽艰险,或经营有道。作者不时流露出对他们的赞美、理解和同情,并表现出对世俗物质利益关注的价值取向。在作品内容市民化的同时,人们的艺术趣味也趋向世俗化,时兴着一种“世俗之趣”。这种艺术趣味的基本特点,就是题材上注重日常琐事,表现上追求率真自然,语言上崇尚俚俗明白,力求怡心悦目的阅读效果。这在小说、戏曲、民歌等通俗文学中表现得尤其明显。

2. 王学左派奠定晚明思想狂飙的哲学基础

晚明思想狂飙的形成还倚重于禅、道、儒三教的融合与世俗化趋势,并以王阳明心学作为哲学基础。自唐代之后,禅、道、儒三教便出现相互融合的趋势。惠能所创立的禅宗是带有儒家痕迹的中国佛教宗派,而宋明理学体系的建立,又是以吸收改造禅、道的个体修炼和宇宙论、认识论的理论成果作为基础的。至于道教,则吸收了佛教的教义、戒律、仪式,而又糅合了儒教的伦理精神。相互融合之后的禅、道、儒三教,共同表现出入世和世俗化、平民化的倾向。

新禅宗、新道教、新儒家所奉行的宗教伦理与入世苦行精神,为尚处于筚路蓝缕的商人—市民阶层所接受。勤俭立诚,自食其力,坚忍不拔,百折不挠,关心外面世界的变化,对社会充满着参与意识,成为处在上升发展阶段的商人—市民阶层的文化品格。晚明思想狂飙所表现的对个性解放与心灵、情感自由的呼唤,正是其文化品格的表现,从哲学来源而言,它更直接地来源于阳明心学。晚明人文主义思想运动的始作俑者和中坚是泰州学派,泰州学派正是明中叶从阳明学派中分化出来的一个哲学派别。

泰州学派是由王学的创始人王阳明的弟子王艮创立的。王艮(1483—1541),初名银,王守仁为他更名为艮,字汝止,号心斋,泰州安丰场(今属江苏东台县)人。王艮本人少年时曾为煮盐的灶丁,壮年才读《大学》、《论语》等书,后拜王守仁为师,以讲学终身,著有《王心斋先生遗集》。因为他是江

苏泰州人,其学派的许多成员也是泰州人,因此被称为“泰州学派”。此派杰出人物还有颜钧、何心隐、罗汝芳、李贽等。他们在时代思潮的激荡之下,成就了一番思想革命的事业。这个学派有一个特点,其成员除封建士大夫之外,还有樵夫、陶匠、农夫等社会下层人物,这在以前是不多见的。王艮青年时曾在山东行医,弟子也多为劳动人民。

为了进一步认识泰州学派在哲学上的派别来源,让我们对中国哲学的发展过程作一个简单的回眸。

中国哲学史上影响最大的是儒和道两家。儒学由孔孟发端,到了汉代董仲舒作一大发展。他融法入儒,成为一代大儒。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遂为官方正统哲学。到了宋代,儒家思想又有了新的发展,出现了五个了不起的哲学家,人称“北宋五子”(张载、邵雍、程颢、程颐、周敦颐)。后来又出现了儒学的集大成者朱熹,他把传统的朴素的儒学理论化、精致化、系统化。众所周知,任何一个哲学家都必须回答一个问题,世界的本源是什么?这是无可回避的,同时也是哲学上划分党派的根本准则。在朱熹的学说中,他认为世界的本源是“理”,所谓“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朱熹哲学中的“理”,无独有偶,和西方哲学家柏拉图的理念世界有非常相似之处。他们都认为,在现实世界之上还有一个“理念的世界”。这个抽象的“理的世界”是高高在上、永恒不变的,现实世界只是它的摹本。因此,人们称朱熹的哲学为“理学”。

理学在当时逐渐成为显学,并被奉为官方正统哲学(南宋理宗把程朱理学钦定为官方哲学)。经元至明,朱熹的地位被越抬越高,他的学说成了神圣的教条,学术界出现了像黄宗羲所说的“此亦述朱耳,彼亦述朱耳”的现象。

到了明中叶,在哲学界又出现了另一个了不起的人物王守仁。王守仁(1472—1529),字伯安,浙江余姚人,因曾筑室故乡阳明洞中,世称阳明先生。他既是个杰出的哲学家,又是个有名的政治家。他是明孝宗弘治时的进士,后因镇压农民起义有功被提升为江西巡抚,1519年又平定了宁王朱宸濠的叛乱,封建新伯,官至南京兵部尚书,并总制两广、江西、湖广军务,成为明中期统治集团的主要人物。王阳明原先也热诚地信奉程朱理学(朱熹把从物质中追求“理”的过程叫做“格”)。有一次,他下决心穷竹子的“理”。他专心致志地“格”竹子这个物,“格”了七天七夜,什么也没有发现,人也累病了。他在极大的失望中不得不放弃了这种尝试。后来王阳明建立了自己

的哲学体系。王阳明的学说发展了南宋陆九渊的“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的主观唯心论，提出了“心外无理、心外无物”，否定客观事物的存在，把一切事物源于人心，因此又被称为“心学”。王守仁还提出“致良知”说，使发源于理学的“心学”一派取得了完备的形态，盛行一时，打破程朱理学的独尊局面。他的学说和朱熹的学说不同，其学说以反传统姿态出现，明中叶以后影响很大，还流行到日本，著作由门人辑成《王文成公全书》，其中主要的哲学著作有《传习录》和《大学问》。《传习录》有上、中、下篇，收在《王文成公全书》卷一至卷三，是他的弟子徐爱、钱德洪等所编，其中主要是语录和书札，是研究王守仁哲学思想的重要史料。《大学问》收在《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六，为王氏弟子钱德洪辑录，是研究心学和理学论证的主要材料。

王学的盛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的。中国的封建制度演变到了明中叶，已陷入沉重的危机中。土地兼并十分激烈，大量土地为皇室和官僚占有，沉重的赋税转移到农民的头上，迫使数以百万计的农民离开土地成了流民，在闽浙、荆襄等地区先后发生了农民起义，规模越来越大。1510年，华北地区又爆发刘六、刘七农民大起义，直接威胁到北京。而明王朝内部，皇室与藩王、宦官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1509年发生安化王的叛乱，1519年又发生宁王叛乱，明王朝岌岌可危。王守仁力图挽回明王朝的危机，他带兵平定了宁王的叛乱，又镇压了江西南部的农民起义和广西少数民族的反明武装。他从亲身体验中感到“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与杨仕德薛尚诚》，《全书》卷四）。认为要消灭农民的反抗，还需通过教育来铲除人们的叛逆和不守本分的心理，而后者比前者更为艰难。王学作为一种思潮，正反映了地主阶级想用加强思想教化的方法来挽回封建社会的危机。那么什么是“心中贼”呢？就是利欲，在“王霸”、“义利”、“理欲”之辨上，陆王和程朱没有原则的区别。按王守仁说：学者学圣人，不过是去人欲而存天理耳。他也认为，圣人之道之所以不能通行，是因为大家讲功利之缘故。在王守仁看来，“功利之见”是圣学的最主要敌人。而要战胜功利之见，既不能借佛老之说，也不能靠以朱熹为代表的群儒之论。王守仁和陆九渊一样，认为朱熹学派的缺点主要在于“务外遗内、博而寡要”（《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所谓“务外遗内”，是指朱熹承认有客观的“理”。王守仁认为这是对唯物主义的让步。所谓“博而寡要”，是指朱熹叫人“即物穷理”、“泛观博览”。王守仁认为这是搞烦琐哲学，不如他的“致良知”学说来得明白简易。

王学作为程朱学派的批判者，包含着两重性：一方面，他嫌朱熹的唯心

主义不够彻底,从右面来进行批判;另一方面,他确实看到了程朱学派搞烦琐哲学,死抱住经书上的字句不放,用许多教条来束缚人。虽然王守仁反对烦琐教条的目的是要人们在培养封建道德意识上下功夫,但他的这种主张在当时具有打破精神枷锁的作用。同时王守仁是一个教育家。他居官时一直讲学,兴建书院、举办社学,并提倡一种不同于程朱学派的“狂者进取”的学风。据《年谱》记载:嘉靖三年(1524年),王守仁在越,正月,“辟稽山书院,聚八邑彦士,身率讲习以督之”;“八月,宴门人于天泉桥;中秋月白如昼,先生命侍者设席于碧霞池上,门人在侍百余人。酒半酣,歌声渐动,久之,或投壶聚算,或击鼓,或泛舟。先生见诸生兴剧,退而作诗,曰:“影响尚疑朱仲晦,支离羞作郑康成。铿然舍瑟春风里,点也虽狂得我情。””(《全书》卷三十四、卷二十)王守仁批评朱熹、郑玄“支离”,而鼓励他弟子们成为“铿然鼓瑟”的曾点,因而形成一种比较生动活泼、教条气息比较少的学风。尽管王守仁的主观愿望是要维护摇摇欲坠的明王朝封建统治,但他所倡导的“狂者”学风对当时封建传统却起了破坏作用。虽然这种学风也产生了很大流弊,但李贽等人的异端思想就是从王学发端而来的。所以我们对王守仁的心学必须作具体分析,不能简单加以肯定或否定。

王守仁晚年用“致良知”三个字来概括他的全部学说,说:“致良知是学问的大头脑,是圣人教人第一教义”,“良知,心之本体”(《传习录·中·答陆原静书》)。王守仁说的“良知”,首先,就是伦理学上的“良心”,即道德意识的主体。其次,“良知”又是天赋的理性。陆王心学常讲“心即理”,以为心为本质、内涵就是天理(天赋的理)。再其次,“良知”是造化的精灵,它是与物无对的本体,天地万物鬼神皆从此出,而人的一切认识和实践的活动,都复归此本体。王守仁实际上使用了先验主义的方法,把封建道德的规矩尺度作形而上学的抽象,说它们是“天理”,并说“天理”是人的良知先天具备的,然后又转过来,说“良知”是造化的精灵、天地的本体,万事万物都是从它产生的,这种构造体系的思辨方法与朱熹没有原则的差别。不过,朱、王的哲学,还是有客观唯心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的差别。朱熹承认在心(个别精神)之外有客观事物和理,在朱熹看来,实在有两个世界,一个是抽象的“理”的世界,一个是具体的物质世界。和朱熹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不同,王阳明的学说中,“心”是世界的本源。王守仁则认为“心外无事”,“心外无物”。心是身体的主宰,而心的“灵明”再不为外物所蔽时,就是本然的“良知”。“良知”之体(意识主体)应感而动,便有种种观念活动或意向作用,观念活动或

意向作用便表现为事物,在王阳明看来,只有一个世界,就是“心”的世界。他说“……充塞天地的只有这个灵明……天地鬼神万物,离却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我的灵明,离却天地鬼神万物,亦没有我的灵明,如此便示一气流通的,如何与它间隔得?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万物的主宰”(《传习录·下》)。

王守仁把“意”定义为“其虚灵明觉之良知应感而动者为之意”(《大学问》),在他看来,“良知”是“意”之体,而事物是“意”之用,所以说“心外无事”、“心外无理”,这里王守仁说的是主观唯心论的见解,同时又具有泛神论的倾向。他把“我”的“灵明”提高到创世主的地位,这当然是主观唯心论;但又说“我”和天地万物是“一气流通”的,“我的灵明”也不能离开天地万物而存在,这又成了泛神论的观点。主观唯心论走到极点便是唯我论。有一次,他的学生问他:“天地、鬼神、事物,千古见在,何没了我的灵明,便俱无了?”他说:“今看死的人,他这些精灵游散了,他的天地万物尚在何处?”先生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与我心亦何相关?”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心外。”(《传习录·下》)这两个学生都以朴素唯物主义观点来提出诘难,而王守仁则从主观唯心主义的立场做了回答:一个人死了,没有这个精神主体,也就没有和它相对的精神对象,即天地万物了。深山中的花,只有在人看到它时,颜色才明白起来,颜色不能离开人的感觉而存在,所以天下无心外之物。这样的论证,以认识论中主客观互相联系和认识内容依存于人意识活动为理由,推论到物质世界不能离开人的意识而独立存在,这里包含着逻辑上不允许的跳跃,是主观唯心主义的诡辩。但正因为王学中,宇宙是一个精神整体,并且只有一个世界,就是我们体验到的这个具体的实际世界。这样一来,当然就没有朱熹所强调的抽象的“理”的世界了。据朱熹的系统,一切“理”都是永恒在那里的,没有“心”,“理”照样存在。而根据王守仁,则是如果没有“心”,也就没有“理”了。由“良知”中产生的“心”是宇宙的立法者,也是一切“理”的立法者。这与康德讲的“心为自然界立法”相似。不过康德讲的是自然界的因果律,而王守仁讲的是封建道德规范,即他所谓“规矩、尺度”。因此,他的学说被称之为“心学”。这样一来,他认为“良知”就是“是非之心”,真理标准、道德标准都是“良知”所固有的,只要“致良知”,那么是非善恶便能判别选择。这是唯心主义的真理论,不过这种理论对传统具有破坏作用。王守仁在《答罗

整庵少宰书》中说：“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传习录·中》），在他看来，如果内心的良知认为是错的，哪怕是孔子说的，我也不说是。如果我内心的良知认为是对的，即使是平常人说的，我也不说非，更何况是孔子、朱熹说的。总之，要以心中的良知作为是非的唯一标准。这话稍作引申，就成了后来李贽讲的“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了。在朱熹那里尖锐冲突的天理和人欲的矛盾似乎也不存在了。但这样的哲学很危险，一切依赖于“心”，心灵的情感欲求恰是所谓“人欲”。这为后来的王学左派带来了理论上的突破口。没有了“理”高高在上压制着人，一切依赖于“心”，依赖于人的主观意识，那么人就有可能冲破封建社会关系的桎梏了。王艮就是从这一点有所突破的。但是正是因为王守仁强调“良知”具有一切是非善恶的准则，一个人只要“致良知”就能成为圣人，因此一个人唯一重要的是努力“致良知”，而不是在追求知识、才能上下工夫。如果不“致良知”，丢了“学问头脑”，那么知识才能只会造成祸患，“知识愈广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传习录·上》）。王守仁把“致良知”提到第一位，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首先要解决思想意识问题、世界观问题，反对程朱学派的烦琐学风，客观上起了破坏封建教条的作用，构成了哲学发展的一个环节；泰州学派正是从这一点上找到了突破口，把王阳明的学说向左发展，掀起了晚明的人文主义思想狂飙。但王阳明也走向了另一个片面，以为“致良知”就是一切，将学习知识、培养才能都放到次要的地位，把科学知识视为无用之物，甚至读书、写文章、增广见闻都被视为“玩物丧志”。这样，王学末流就变得非常空疏并导致蒙昧主义了。

二、泰州学派的主要思想贡献

在论述了泰州学派的经济基础和哲学渊源之后，再来看一看泰州学派在中国思想史上的贡献。他们的贡献主要有以下几点：

1. 论述了自然人性存在的合理性

人的自然属性如情感、需求、欲望等是人生来俱有的，食色声味的满足是人类存在的必要条件。但人生活在社会群体中，又被赋予了一定的社会属性。不可缺少的生活秩序、伦理道德等社会规范的建立，对人类的存在发展至关重要。以上二者相互依赖又相互对立。如何解决这一对矛盾，是历来思想家、政治家不容回避的问题。孔子在创立原始儒学时便提出“克己复